

主 编 毛 磊 吴传煌 刘录开

中国的平均主义

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的话

平均主义是一种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都具有深刻影响的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所以对平均主义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有相当的难度。由毛磊、吴传煌、刘录开三位教授主编的《中国的平均主义》一书，是他们多年来探索研究的结果，其中阐述了他们对平均主义的一系列见解，系一家之言。我们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出版该书，以期推动对中国平均主义的深入研究和探索，进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序 言

由中南财经大学毛磊教授、兰州商学院吴传煌教授和北京商学院刘录开教授担任主编的《中国的平均主义》一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表示热烈的祝贺！这本书的写作历经八年多，作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材料搜集丰富，引用也比较得当。关于中国的平均主义，近年来有较多的研究者涉猎，但比较零碎，而且多数文章都着眼于现实。对中国平均主义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和比较系统的历史考察，并编著成册，本书是个开创，填补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著述的空白，为我国学术界今后研究平均主义提供了一条比较完整系统的线索。因而它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它的出版是值得称许的。

中国的平均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在古代中国，平均思想和平等思想就已出现。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曾经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墨子在《尚贤篇》中说：“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就有了平均、平等的观念。在中国封建社会，平均平等思想就成了进步思想家和农民领袖的理想和思想武器。不过，地主阶级思想家所主张的平均，是反对大地主超量占有土地和财富，主张在地主阶级中相对“平均”地占有土地和财富，而不是主张在广大农民和地主之间平均财产。因此，这种平均思想是为地主阶级的长治久安服务的。至于农民领袖的平均主义思想，是产生于农民小生产者固有的观念形态。由于这个阶层政治上、经济上都处于被支

配地位，他们在政治上要求平等，在经济上要求平均。特别是在封建社会某个特定阶段，当农民小生者相率破产，挣扎在死亡线上时，由此引发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其代表人物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大多是没收地主的财产分给农民，即所谓“割富济贫”。这是一种极其原始的“均”产办法，还不好称之为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到封建社会中后期，平均主义才成为农民领袖的追求目标。唐末农民领袖黄巢自称为“均平大将军”，意在表明他要替农民“均”地主的产。北宋农民领袖王小波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平均主义思想比较明确，但他们的做法，也只是“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基本上还是“割富济贫”。明中叶以后，在封建经济中，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农民有较强烈的摆脱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思想，平均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明确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虽仍找不到有效的“均田”办法来，但曾经在其部分占领区里实行“许业主认耕”，使部分农民从地主阶级手中“均”到部分土地，轻轻地触动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到了清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平均主义思想才比较完善，制定了比较全面体现平均财产和平分土地的《天朝田亩制度》，而且其中许多内容在起义初期已经以圣库制度的形式实行过。在农民战争的进军阶段，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是起过积极作用的。正如列宁指出的：“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均’地产的思想是正当的和进步的。”（《列宁全集》第13卷，第217页）

但是，平均主义思想不管在哪一个朝代出现，其思想体系都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因而也不可能代表进步的历史趋向。实际上，不论是农民还是农民领袖，他们赞成平均财产，只是主张

“均”地主的产，从来也没有想到在夺取政权之后要真正实行平均财产。当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之后，平均财产的思想，就不再是农民对地主的斗争武器了。

不过，平均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意识观念，它是有相对独立性的。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甚至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之后，还可能在新的土壤中出现。如新中国建立之后，有一段时间，曾出现过吃大锅饭、一平二调的平均主义倾向。在新的土壤中出现的平均主义思想，不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都不具有进步意义。因此，列宁又指出：“农民的平均制思想，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是反动的和乌托邦的。”（《列宁全集》第12卷第452页）在研究平均主义的历史时，只有把平均主义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出现，放回到各自特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去考察，才能对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平均主义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中国的平均主义》一书的出版，是我国史学领域的又一新成果，它有助于对平均主义的研究的深入。我衷心地期望本书能较快地和读者见面，让更多的学术界人士，共同来探讨中国平均主义的历史现象，以及它对当前和历史上的所产生的影响。这里我所阐述的一些观点，个别地方可能有悖于本书的内容。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借此谈谈自己的看法，以便和同志们共同探讨这个问题。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苏双碧于北京沙滩

湖北省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课题

本书顾问

徐子伦 湖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

何盛明 中南财经大学校长 教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中国古代史上的平均主义	(28)
第一节 农民起义领导者的平均主义	(28)
一、两宋以前农民起义领导者的平均主义思想	(29)
二、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发展的新阶段	(36)
第二节 地主阶级思想家的“平均”思想	(45)
一、两宋以前地主阶级思想家的“平均”主张	(46)
二、两宋以后地主阶级思想家的“平均”主张	(52)
第二章 中国近代史上的平均主义	(61)
第一节 农民起义领导者的平均主义和地主阶级的 “平均”主张	(61)
一、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平均主义	(62)
二、地主阶级的“平均”主张	(66)
第二节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平均主义思想	(73)
一、康有为的平均主义思想	(73)
二、严复和谭嗣同的平均主义思想	(79)
第三节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平均主义思想	(84)
一、孙中山的平均主义思想	(84)
二、章太炎的平均主义思想	(92)
第三章 中国现代史上的平均主义	(97)
第一节 平均主义对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影响	(97)
一、无政府平均主义的传入及其主张	(98)

二、无政府主义对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影响	(103)
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平均主义的决裂	(111)
第二节 平均主义对农民运动的严重干扰	(116)
一、平均主义对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消极影响	(117)
二、苏区土地革命中的某些平均主义倾向	(120)
三、党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政策与农民平均 主义的根本区别	(129)
第三节 平均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	(138)
一、平均主义对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影响	(138)
二、平均主义对中央苏区工人的影响	(144)
三、陕甘宁边区国营企业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	(149)
四、王实味的平均主义思想	(154)
第四节 平均主义在工农红军中的影响	(160)
一、红四军中的平均主义倾向	(160)
二、王明的军事平均主义几乎葬送中国革命	(165)
第四章 中国当代史上的平均主义	(179)
第一节 农村工作中的平均主义	(179)
一、农业合作化洪流中的几个平均主义浪花	(179)
二、人民公社化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平均主义运动	(186)
三、庐山会议后平均主义的再次泛滥	(191)
四、“文化大革命”和两年徘徊期间平均主义的发展	(194)
第二节 工商业工作中的平均主义	(200)
一、手工业及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平均主义 影响	(200)
二、工业管理体制中的平均主义	(204)

三、商业管理体制中的平均主义	(209)
第三节 上层建筑某些领域中的平均主义	(211)
一、组织人事制度中的平均主义	(211)
二、教育和科技体制中的平均主义	(213)
三、文化平均主义发展的高峰	(216)
四、“文化大革命”中无政府平均主义的空前泛滥	(218)
第四节 分配制度中的平均主义	(219)
一、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	(219)
二、职工福利事业中的平均主义	(223)
第五章 改革对平均主义的冲击与平均主义的反冲击	(229)
第一节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平均主义的冲击	(229)
一、农村改革对平均主义的冲击	(229)
二、平均主义对农村经济改革的阻挠	(236)
第二节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对平均主义的冲击	(242)
一、企业改革对平均主义的冲击	(243)
二、平均主义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反冲击	(255)
第三节 政治、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对平均主义的冲击	(263)
一、政治体制改革对平均主义的冲击	(263)
二、平均主义对机构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阻挠	(268)
三、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对平均主义的冲击	(272)
四、平均主义对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阻挠	(278)
第四节 改革对分配制度中平均主义的冲击	(280)
一、工资福利制度改革对平均主义的触动	(280)
二、平均主义对分配制度改革的阻挠	(285)
三、分配不公的恶化是对平均主义的“惩罚”	(289)

第六章 克服平均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	(300)
第一节 平均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	(301)
一、平均主义长期存在的原因	(301)
二、平均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期制约	(308)
第二节 奠定克服平均主义的基础.....	(314)
一、划清社会主义与平均主义的界限是克服平均主义 的理论前提	(315)
二、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是克服平均主义的经济基础	(320)
三、深化改革是克服平均主义的体制基础	(321)
四、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是克服平均主义的文化基础	(325)
五、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是克服平均主义的现实基础	(329)
后记.....	(331)

绪 论

本书是一本难度较大的著作。从1983年开始研究这个课题，至今快要十年了。从提纲到初稿再到第二稿、第三稿，反复了很多次，现在这算是第四稿。之所以四易其稿，主要是因为这个课题是政治性、理论性、政策性都很强的课题，也很敏感。但因为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初“南巡”时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胆子要大一些，才给了我们以精神上的鼓舞。按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我们对稿子又作了些修改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戏剧界的人说“十年磨一戏”，本拙作也可以说是“十年磨一书”了。上面说了这么多，没有别的意思，只想说明一个问题：平均主义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是史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个空白，又是学术性、思想性、政治性很强的课题。要把这个前人没有很好研究过的问题加以综合研究并撰写成专著，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但需要作者的刻苦努力，还需要吸取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复思索后才能写成一本象样的著作。我们正是本着这个原则写作此书的。

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对平均主义研究的开展，在写作过程中碰到了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不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就无法撰写本书。我们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按照“双百”方针，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作为本书的指导思想，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一、研究中国平均主义的目的

我们这些作者都是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教学工作者，为什么“不务正业”去研究中国平均主义呢？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时发现，平均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特别是王明的军事平均主义几乎葬送了中国的革命。毛泽东曾极为痛心地说：“军事平均主义，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了极点。‘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①这就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开始时的惨败，把中国革命推到毁灭的边缘。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路线，主要是结束了军事平均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才挽救了中国革命。在讲授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阶段历史时也发现：由于平均主义在这段时间内的泛滥，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同样把国家推向灾难之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我国各项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赢得辉煌胜利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指导思想上划清了社会主义与平均主义的界限。同时，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仍然受到平均主义的阻挠与破坏。在有些方面是很严重的，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目睹平均主义肆虐中华大地，作为史学工作者，在痛心之余需要的则是冷静的思考。也就是说：史学工作者要为推进祖国的现代化服务。如何服务呢？最好的办法是“以史为镜”，从研究平均主义的历史去为彻底克服平均主义提供条件。这就是我们研究平均主义的出发点，也是我们撰写《中国的平均主义》的初衷。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下同），第225—226页。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平均主义传统的国家。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被后世奉为至理名言并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圭臬世代相传。所以说平均主义在中国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对中国的历史产生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作用又有消极的作用。随着历史进入20世纪后，积极作用日益减少，消极作用日益增多，这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七十多年中，虽然对平均主义作过多次的批判，但大多是就事论事，缺乏全面的、系统的深入剖析。既缺乏对它的产生与发展的纵的研究，也缺乏横的研究，更没有综合的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指导思想上虽与平均主义划清了界限，但无论是在人民群众中还是在学术界，对平均主义的反动性、欺骗性、顽固性及其对中国人民事业的严重危害性，仍然没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党中央及各级领导机关推出的克服平均主义的改革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受到种种抵制，严重阻碍改革开放的发展。

为了实现党和国家提出的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的水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和更加定型的制度，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必须坚决克服平均主义。否则，这些目标都可能会落空。要克服平均主义，就要深入研究它的本质、表现形式、历史发展轨迹、现实影响以及克服平均主义的步骤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为我国的大踏步前进清除路障，这就是我们研究中国平均主义的目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的好：“当中国完全进入市场经济并且国营工业不再接受补贴的时候，香港和台湾所做到的事情，中国（指大陆——引者注）也将能够做到。”^①就是

① 美：《幸福》杂志1992年10月5日。

说，只有打破国营企业“吃大锅饭”等平均主义弊端后，大陆经济才能真正发展。本书就是研究如何克服平均主义从而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问题。

二、平均主义的概念问题

平均主义的概念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对它作出界定是困难的。但从我们研究此问题的过程中体会到，要对平均主义进行界说，则需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平均主义的界定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对平均主义的实质都作了揭露。《共产党宣言》指出空想社会主义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揭露杜林之流是“激进的平均主义”。列宁认为“小资产阶级的‘土地平分’运动，这是一种幻想，是一种空想”，^①并分析了这种幻想的阶级实质。列宁指出：“乌托邦的产生反映了这样一些阶级的利益，它们进行着反对旧制度，反对农奴制度，反对政治压迫的斗争……而在这种斗争中，它们又没有独立地位。乌托邦、幻想，是由于这种不独立和软弱性而产生的。幻想是弱者的命运。”^②斯大林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对平均主义作了进一步较具体的论述，他指出：“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是原始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③马恩列斯的这些论述是很精辟的，抓住了平均主义的实质，但并没有给平均主义下一个简单

① 《列宁全集》第11卷，第297页；第18卷，第350页。

② 同上。

③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04页。

明了的定义。

毛泽东早在1929年底就提出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问题。但也只分析了它的产生根源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①1948年，他在一次讲话中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②这两次论述只论及了平均主义的性质和来源，也未给平均主义下一个完整明确的定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均有批判平均主义方面的论述，但都没有作出概括性的界定。

中共中央的文件中虽也有关于批判平均主义的内容，如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指出：平均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观点是完全不相容的。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平均主义思想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严重障碍，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这个分析也是很深刻的，揭露了平均主义的实质及其危害性，同样没有给平均主义下一个简单明了的定义。

（二）本书对平均主义的界定

由于对此问题研究的不够，学术界对平均主义作出的概括也很少见到。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关于这个条目是这样写的：“平均主义，亦称‘绝对平均主义’。要求平均享有社会一切财富的思想。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主张消灭一切差别，要求人与人之间在工作条件、生活条件、物质分配和个人需要等方面绝对平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直接违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具有落后性和破坏性。”这个定义是在总结几十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的，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就是在这个概念的基点上又深入探讨的，对此定义有所补充、丰富与发展。主要

①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版），第91页、第1314页。

是以下几方面的发展与补充。

第一，关于平均主义的内容。学术界往往将平均主义囿于经济范畴。我们认为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伦理、心理等各方面都有平均主义的表现。经济平均主义要求平均分配社会的一切财富。政治平均主义追求绝对平权，否认一切权威，要求极端民主化，提倡无政府主义，包括在干部管理制度上的“铁交椅”、“论资排辈”等等。军事平均主义主张平分兵力，拒绝集中兵力，在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战争中都给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失。文化平均主义不是把没有文化的体力劳动者提高到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水平，而是把有文化的劳动者拉向倒退，用这种愚笨的办法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伦理平均主义要求人与人之间不仅在身份地位，而且在聪明才智乃至道德情操等方面，也不应有高低、智愚、善恶之别，可以说把平均主义“升华”到了九霄之上。心理平均主义，恪守中和，反对偏重，“一刀切”，用一种思路（强调事物雷同），一种模式（追求公平和谐），一种方法（主张整齐划一），去看待和处理千差万别、形形色色的事物。其它领域里的平均主义都与心理平均主义不可分割。总之，平均主义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决不只限于经济领域之内。这是我们与一些学者存在的不同看法。

第二，关于平均主义的性质问题。《辞海》中该条目的作者认为平均主义只具有“落后性与破坏性”。这样界定是不够全面的。必须严格按照毛泽东界定的：“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毛泽东把平均主义的“反动性”放在其性质的第一位，这决不只是简单的次序排列，而是提醒人们应深刻认识平均主义的反动实质。邓小平早在1948年就尖锐指出：“我们许多领导同志，至今还没有真正觉悟到这种农业社会主义的破坏性是反动的罪恶的

行为，对于人民的利益和党的政治影响都是难以估计的损失。”^①邓小平这段精深的论述包含以下三层意思：一是农业社会主义在当时就是指的平均主义，这在当时党的正式文件中有明确的说明。正如薄一波指出的：“从1948年到1951年，在报刊和内部文件中，‘农业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作为农民平均主义的同义语被广泛使用的。”^②第二层意思是，把平均主义的破坏性提高到是“反动的罪恶的行为”（着重点是作者加的）这样的高度，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有关论述中是独一无二的。第三层意思是把平均主义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危害性，提高到“难以估计”的地步（着重点是作者加的）也是令人深思的。毛泽东、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核心人物，早在1948年就严肃指出“平均主义的反动性及其罪恶的严重性。对于这个科学论断应如何理解呢？即为什么说平均主义是反动的东西呢？我们知道，判断一个事物是进步与反动的根本标志是看它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凡是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就是进步的东西，凡是阻碍与破坏生产力发展的就是反动的。当中国进入20世纪40年代末期时，亿万人民的要求是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实现祖国的现代化。而平均主义则阻碍现代化的进程，因为“这种绝对平均主义主观地希望把那在工业上和农业上已发展了的和正在发展（这种发展在目前阶段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的社会经济，还原为封建时代那种孤立的小农式的社会经济……还原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是违反社会历史的发展、违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使之后退的。所以这种想法和这种做法，乃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③平均主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这种内容，决定了它的反动性。对此不应有丝毫的含

① 《邓小平文选》（1938—1965）第114—115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09页。

③ 《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新华社1948年7月27日。